

国家主义与社会意识话语权争夺的空间实践 ——近代银座政治文化的形塑与变迁(1872-1945)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瞿 亮

申健鹏

[摘 要] 银座作为日本近代化空间政治的典型样本,其发展历程揭示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意识在现代化建设、殖民扩张以及战争动员中的话语博弈。从明治维新到昭和初期,双方围绕着银座的话语权进行长期争夺。最终在昭和战争与军事化时期,国家通过军国主义宣传系统,成功实现了街道空间的军事化转型,街道变成了军事宣传的画廊,其街区模式成为帝国主义空间殖民的宣传模板。银座话语权及意义建构的演变史,不仅反映了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官民话语权争夺的典型缩影,而且揭示了文化断裂、社会分化以及民众主体性被军国主义吞噬的结构性困境。

[关键词] 近代日本 银座 帝国主义 消费主义 军国主义

引 言

现今的东京银座被视为世界三大繁华中心之一,以昂贵和奢侈闻名。而在《东京百年史》《东京都的百年》等日本都市史著作当中,被视为反映日本近代变化的公共空间(爱德华·塞登斯蒂克,2017;石塚裕道、成田龙一,1986)。城市的公共空间对于政治史和近代史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是政府进行各类政治活动的场所,也是社会表达意愿的地方,因此二战后相关研究发展迅速,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包含“构想的空间”与“生活的空间”(亨利·列斐伏尔,2021)。基于这一理论,银座作为明治初期由官方主导规划的街区,反映了内治工业优先派焦急的“欧化”心理,体现了旧士族和民众面对强行植入的近代化的不安和焦虑以及民权派争取民主权利的急迫性。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又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消费主义交织的场所。到了全面侵华时期又被军国主义彻底征用。纵观银座的变化和发展集中体现了公共空间与社会意识的变迁。

目前关于银座的研究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0年代左右,这类型研究多从风俗和文化角度展开分析,以著者的亲身体验和介绍为线索,着重介绍银座在明治至昭和初期的社会文化变迁(安藤更生,1931;小野田素梦,1930;石角春之助,1937)。第二阶段是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左右,突破了上一阶段局限于文化和风俗领域的桎梏,拓展到了政治、权力和社会层面,野口孝一(1992)率先以自由民权运动与银座的联系开创了银座政治史研究的新局面;初田亨(1981、1994、1999)揭示欲望等因素在都市变迁中的作用,对都市消费空间及繁华街的研究为银座史研究提供新视角与方法;冈本哲志(2006、2003)主要侧重于银座街区空间和建筑的变迁以及由此体现的权力意志;此外藤森照信(1982)、藤森照信、小沢尚(1986)更加清晰地阐明了银座炼瓦街修筑计划背后的权力逻辑。2020年后,由于新冠疫情以银座为代表的繁华街区大受打击,但也刺激了银座研究向女性主义、少数人群的社会史方向发展,野口孝一逐渐将银座研究的视角拓展到

银座社会边缘群体,揭示了近代日本除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外,还存在着女性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发展(野口孝一,2024)。小关孝子则注意到银座风俗咖啡馆兴盛的社会原因和多元社会关系(小关孝子,2023)。

但上述研究并没有从话语塑造与公共空间关系的角度阐述国家意志与社会意识的角逐。银座自建设之初就作为明治政府推行“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的宣传空间,但社会民众则依然沉浸在江户时代的文化传统之中,故它自诞生以来就深陷国家意志与社会意识的角力场域。明治政府通过砖石街道与西式建筑,将银座打造为“文明开化”的橱窗和“殖产兴业”的看板,试图以物质空间的可视化塑造社会意识。然而,街区终究是具身化的生活容器,当国家意识以“进步”之名强行植入时,导致民众的竭力抵抗:明治初年银座町人们的反抗和怨恨,民权派在四丁目交叉点的政治演说、大正时期的摩登女郎、“银座漫步”、咖啡馆兴起,这都体现社会民众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与国家意志争夺着银座的话语权。直至昭和时代,战争文化和法西斯高压控制最终实现了话语和意识形态统合,使银座完全沦为了战争动员和宣传的工具。本文以此为视角来重新看待银座话语权塑造背后的国家与社会的抗争以及日本近代化的诸多弊病,以期揭示文化断裂、社会分化以及民众主体性被军国主义吞噬的结构性困境。

1 改革时期文明开化与民族主义的龃龉(1872-1890)

江户时代的银座是一座功能单一火灾频发的商人町,街路骨架简洁明了,土地所有权关系相对简单,政治意义相对淡薄。但在开国后却呈现独特区位优势,一方面毗邻外国人聚集地筑地,另一方面横滨铁路直通东京的终点站新桥车站落成于银座近旁,银座就此成为欧美文明涌向首都核心区的门户,发挥“文明开化”前沿的作用。1871年,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诸国,亲眼见证了瓦斯灯映射下星光点点的运河与砖瓦紧密铺设的道路所呈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景象,意识到可通过营造砖石街道并以此为样板紧跟欧美列强(久米邦武,1878:40-41)。1872年银座发生大火,由利公正和井上馨鉴于东京防火的迫切需求,计划用西洋红砖建设一座炼瓦街区来引导东京的防火化建设。由此银座炼瓦街拔地而起。

为了树立维新形象,明治政府一方面以炼瓦建筑取代日本传统木制建筑,另一方面积极建构炼瓦建筑的“文明开化”“治世”话语体系(闲亭茂,1884:14)。鼓吹银座“百般事情所未曾于往日之有,而独得于文明开化之今日,其繁华毫不带江户旧样,可谓东京之新繁华也”(关梅痴,1882:1-2);“夜晚瓦斯灯灿若白昼,人民往复颇盛,昼夜人迹不绝,实乃东京第一街巷”(由利兼次郎,1878:15)。亦有诗人作诗颂赞“文明进步预应知,银座街头美亦丽,炼化叠成洋样阁,里仓粉壁碧琉璃”(石川义畅,1882:6)。在这过程中官方利用各种宣传手段赋予银座街区“文明”“西洋化”的政治意义,将其渲染为日本与西洋列强共进退的看板。

然而官方在施工中不顾社会风俗和民众利益的强硬手段损害了居民们的利益。面对土地强征和迁入的诸多权贵们,居民们一方面以一丁目药屋商人笠原五郎兵卫为首组建“炼瓦街反对期成同盟”与政府对抗(筑地警察署史編集委员会,1973:49)。另一方面也制造出与官方相背离的言论,居民们怨恨道:“虽拥有私有土地、安居私有房屋,一旦受政府严令,即便厌烦严霜积雪,也不得不忍受流离颠沛、甘受饥寒。究竟能否违背啼哭幼儿的意愿?想必规则本意并非如此,然我辈愚钝,心中的疑虑实在难以消解”(野口孝一,1992:27)。还有文化人士写诗做讽“银座之边多富豪,万金费去未有劳,一炬怜他归烧土,独炼化石声天高”(马场不知姣斋,1881:7)。社会也对这种盲目的西化浪潮表示不满,称那些“开阔眼界的,皆是那些迷惑内心之人……其样子恰如农夫入东京,看到银座繁华而憧憬无异”(ディスターネル,1885:下篇32)。“银座虽称府下第一等佳街,富商所居、商卖殷盛,然此市街一小区域,出银座所见皆旧式家屋”(本富北山,1887:44)。连行道树也被批判为“银座的植树不知目的为何,对本国事业未做任何实质之事,仅做外形并支付费用”(福岡照,1887:25)。“文明开化”这一话语的效用在社会中遭遇抵触。

不过,尽管明治政府在宣传“文明开化”的话语方面遇到挫折,但“殖产兴业”的正面形象建构却有所突破,其中的关键便是劝工场的设立。明治时期的劝工场被视为“殖产兴业”的代表,根据《改正东京案内》记载,1883年东京12座劝工场,其中9座位于银座及其毗邻的日本桥、神田(儿玉永成,1884:76-77)。官方希望能够“庶民纵览,智识渐进、物产繁殖”(小笠原美治,1883:附录18-19),因此展览物品免费参观,并对展览物品进行评价以分优劣,竭力提升民众的观感(大藏省印刷局,1886年4月12日:104)。宣传“赤炼瓦二层建筑,各种物品陈列,商卖颇繁荣”(菅复三,1890:103)。在此情况下劝工场成为“游乐园”,许多人童年在这里度过了诸多欢乐时光(内田诚,1940:62-63)。银座成为“装饰佳丽自然卖品亦需美物,其劝工场、新闻社至夜灯火辉煌如不夜之城”的地方(小岛猪三郎,1893:第二篇名迹志12)。东京市民也将银座视为东方的巴黎(寺尾熊三,1890:668)。1899年规模最大的帝国博物馆在银座落户,更是昭示着银座对“殖产兴业”的重要意义。而之所以“殖产兴业”话语宣传在银座得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治时代紧密的政商关系,政府和商人宣传劝工场“助商工业隆盛,谋国家富强”的作用(三原国一郎,1888:12),突出“民富”与“国强”的连带感,促进其早期资本主义发展。

看似“殖产兴业”在银座生根发芽,但一方面劝工场的意义被民众曲解,在明治时代发挥的作用,更接近之前的杂耍表演、庙会集市、物产会,民众认为它是汇集新奇物品,人人都能欣赏的展示场(贞包英之,2012:52-53)。另一方面,根据郵便报知新闻对银座路人的统计,在服装方面,传统的棉衣、外褂、带印花日式短外套大量存在,这是市民受限于经济条件,选择低廉、耐穿衣物的无奈之举。4%的市民连草鞋都无力购置,只能裸足,足见部分市民生活窘迫。参考浅草和两国等地半裸、赤足者超1成的情况,可侧面反映东京市民贫穷现象的普遍性(青木宏一郎,2004:292)。且劝工场出售的物品多品质低劣,虽然部分劝工场在价格便宜的基础上改进商品质量,但在大阪廉价主义风潮的涌入下,劝工场商品的质量依然堪忧,银座有名的龟甲小百货店判断在劝工场开店恐怕会损害本店信誉,便撤出劝工场(金子佐平,1887:12、222)。作为东京局部欧化的代表,银座街区一度被社会戏谑地称为“日本桥近旁一里四方位的开化之地”(木戸公伝记编纂所,1931:13-14)。这种尴尬局面导致明治政府对银座诞生之初的政治意义与话语权力的塑造不仅是失败的,也为后期自由民权运动争夺银座话语塑造的主导权埋下伏笔。

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推进,银座的政治意义逐渐发生变化,成为民权派反抗藩阀的主要阵地。由于银座在近代的特殊历史背景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报刊聚集的中心,日本西洋纸质印刷报纸的始祖由英国人布朗克创办的《日新真事志》便在银座发行(安藤更生,1931:359-360)。在国会开设请愿运动以后,全国民权派在银座接触形成了“首都民权”这一概念,在此期间各民权派社团、报刊、出版社和演讲会纷纷在银座成立。因此在明治十年代前半拥有众多报刊、杂志社和代言人事务所的银座逐渐成为民权派的主要阵地(石塚裕道、成田龙一,1986:42)。

1880年11月至次年2月,国会期成同盟第二次大会和自由党(暂定)银座事务所相继在银座举办和设立(宇田友猪、和田三郎,1910:438、673),同期大隈重信在银座组建立宪改进党。由此各方势力齐聚银座,利用银座优越的地理位置收集信息、宣传主张和动员社会。一时间银座演讲之风盛行(野口孝一,1992:113)。比如在银座新富座剧院举行的反对北海道开拓使官有物私下贩卖的大演说会上,以高梨哲四郎的“北美政治家的腐败”为开头,警醒国民“关键地位若为萨长土肥四藩人士之阶梯,我国内外形势既已效北美合众国”(高梨哲四郎,1881:23);以福地源一郎的“论开拓使官有物的处理及财政”为结束,鼓吹“如今到了使民愤懑之力愈强之境,独裁政治止,立宪政体见”(福井淳,1888:51),达到了“观众集结五千人前所未有者……以至于人心沸腾,家户相传政府之难,若不速开国会,则前途未知”的局面(竹越与三郎,1891:194)。而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接受民权思想,银座周围将“自由”与商业绑定,通过吆喝贩卖推广民权言论。日本桥有由佐野屋彦兵卫管理的旅客宿舍被作为自由党指定宿舍(野田幸内,1883:158),大内藤次郎的酒铺售卖“自由酒”

(深满池源次郎,1885:35),有的地方还出现了“自由糖”“自由丸”“自由亭”等物(中野了随,1884:14-15)。然而这些以“自由”之名贩卖的商品却在不断扭曲着“自由”,社会舆论称此举只为迎合世间人情借“自由”之名追逐商业利益(《团团珍闻》,1883:5731);纷纷讥讽闻“自由之物皆鸣,那蝉属自由党,民权家费尽心思发声,还有新闻从业者也在发声,像茅蚴之类,为追求金钱而鸣叫”(《团团珍闻》,1882:4221)。原本应该是高尚政治理想的民权运动,在银座却与世俗资本商业利益绑定起来,其原有的革命性和斗争性被算计和牟利取而代之。

面对民权派对银座政治意义的重塑,明治政府迅速展开行动。1879年5月颁布《官吏政谈演说禁止令》、1880年4月5日公布《集会条例》,要求举行政治相关的演说集会必须将各类信息提前交付官方报备,结社必须得到官方批准(藤江堪藏,1881:1)。1887年颁布的《保安条例》,以“阴谋内乱,妨碍治安”为名禁止有居所者寄宿在皇居三里以内的地方(富山县警察部,1893:125),目标直指活跃在银座和日本桥等地的民权派。借助这些法令,明治政府大举镇压民权派,一方面宣称民权派“借助讲谈国事政体以结社和开演说会,实则是煽动民心,妨害国安”(阿部又郎,1882:66)。另一方面不断向自由党施压,从“自由党看板事件”,以自由党象征性缴纳两日元罚款并撤去自由党本部招牌结束,到直接以“无根妄说”为名把为《东洋自由新闻》鸣不平的松泽求策关入监狱(大审院,1891:278)。明治政府也借此不断强化对银座话语权的掌控。

然而面对官方的打击,民权派不仅没有奋起抵抗,反而逐步向国权倾倒。这一时期也是征韩论盛行时期,民权运动竟逐渐倒向对外扩张论调。由于不满政府在甲申事件中对外政策的“软弱”,大量位于银座的民权系报刊纷纷咒骂政府,《自由新闻》更是直接喊出“向宇内展示日本兵之武力”(《交询杂志》,1885:东京六新闻社说句日表)。民权派势力混杂民众举着插着猪头的竹竿涌向位于银座的主张非战论的朝野新闻社进行打砸(石川谅一,1929:336)。自由党内更是有部分党员主张捐献财物抚恤被杀日军家属,甚至于组建义务兵前往朝鲜(宇田友猪、和田三郎,1910:354)。在此情况下,民权派纷纷放弃批判性话语建构,投向国权的怀抱。

由此在官方“满足”立宪呼声颁布“宪法”后,政府顺势收编民权,藩阀政府成功夺取了银座的话语主导权。在银座举行的立宪庆祝仪式上(新桥-京桥-日本桥一线),道路两旁排列了数十所学校的学生、五十多名艺伎,纷纷祝奉陛下万岁(《宪法杂志》,1889:32),银座的印刷业者们也在大门上竖起两面大旗“宝祚万岁”“宪法万岁”(山本谦次郎,1889:163)。由银座三丁目电灯会社制作的花车装饰着国旗在京桥区内行进(清水义郎,1889:6),当天夜“近卫军乐队的喇叭如雷鸣,花之都里,行幸的山车行进着,银座的街道上,电灯闪耀,众多民众喜悦”(丸山正彦,1889:23)。此时的银座极力营造“一君万民”“举国一致”的政治氛围。然而多数人都不知道宪法的具体内容(田中彰,1968:161)。

明治时期的银座是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对它全新政治意义的塑造却刺激了民众对文化主体性丧失的集体焦虑。最终催生了自由民权运动的空间抵抗运动,通过《自由新闻》等报刊集群构建的“首都民权”话语场域、新富座剧场的政治演说,以及银座四丁目交叉点的街头集会,民权派试图将银座塑造为反对藩阀政府的政治抗争空间。然而,其话语塑造始终受制于天皇制框架的合法性依赖与革命意识的薄弱,未能突破国家权力的结构性约束,反而被政府通过扩张国权建立天皇专制将其收编。进入帝国扩张阶段后,在战争动员和民族主义宣传下,银座彻底倒向帝国主义。

2 扩张时期帝国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合流(1894-1931)

面对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果实,激发了银座各商户对于对外扩张政策的狂热支持。在此之际,不仅官方热衷于在银座举行各种胜利仪式,许多商户也开始从物质到思想自发地拥护对外扩张,纷纷标

榜自己的爱国和民族属性。由此在对外扩张政策滋养下,银座迅速成长为“东京文明的象征,商业繁荣府下第一市场”(《商业资料》,1896:43),这为消解银座的政治批判色彩埋下隐患。

战争当中,银座各企业纷纷将“爱国”宣传与商业生意绑定。天狗烟草为甲午战争的日军提供五十万包烟草供给(佐佐木惠璋,1894:32),打出了自己“益国天国,爱国天狗”的招牌,标榜自己的烟叶是“日本纯粹”(岩谷商会,1902:广告页)。在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华之时,新年祝贺标题就是简单的“恭贺新年,大日本帝国万岁!”(岩谷商会,1901:广告页)。千住制绒所特地关闭了在银座的商店,专心生产日俄战争中日军所需的军服(《染织新报》,1905:3)。天赏堂在甲午战争期间向日军申请使用兵器废铁来生产纪念指环(江泽富翁,1940:50-51)。而对帝国主义的附庸也让它们获益颇丰。天狗烟草借用甲午战争为契机,利用极度高涨的“国家主义思想”,将烟草生意与爱国绑定,用爱国的招牌来打击作为竞争对手的西洋烟草(鹤月洋,1965:105)。由此获益颇丰,其广告“勿惊税金两百万,慈善雇佣工人十万”熟知于日本烟民(岩谷商会,1901:广告页)。天赏堂则积极与乃木希典绑定,在银座大街举办的凯旋式上,乃木希典向天赏堂购买了38个金钟表,雕刻“颁恩赐第三军”分发给第三军司令部的部下(江泽富翁,1940:111-112)。风月堂则在甲午战争伊始就获得日军的价值三十万日元,总重三百万斤的军用饼干订单(木下敬正、河野左十郎,1904:26)。日军对于风月堂的食品也是赞赏有加,称“经常给伤病号补充营养或用来祭奠死者”(若林钦,1898:40)。借助战争,风月堂不仅获得了巨额订单,还得到了一次绝佳的宣传机会。

企业积极迎合政府对外扩张政策,标志着帝国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合流。大量商户为对外扩张提供巨大帮助且取得巨额利润,大隈重信赞扬道“并非只有军人勇敢,也不能忘记商人同样强大。毋庸置疑,实业家只要奋起,必能取得超越军人的大胜”(大隈重信,1905:96)。通过参与瓜分对外扩张的胜利果实,极大刺激了银座及所在企业的发展,其地价在从建成前不过5日元每坪,飞升到1913年的500日元每坪(藤森照信,1982:36)。在侵略暴利的刺激下银座最终成为暴发户云集的“成金之地”(爱德华·塞登斯蒂克,2017:206)、“土一升,金一升”之地(一亭吞气,1897:8)与外国人认可的充满魅力之地。(The Times, 1918)但其发展模式也为昭和全面战争时代埋下隐患。因此在日俄战争后日本迎来了所谓的大正时代,社会上形成了罕见的自由宽松的氛围,民主和消费色彩逐渐取代战争色彩,但是帝国主义与消费主义合流的本质却并没有改变,而在此基础之上双方的话语权争夺却显得更加复杂。

大正时代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期,作为东京核心的银座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例如1913年发生的“国民新闻社袭击事件”中,银座被卷入其中。宪政拥护者先袭击了京桥日吉町拐角的官方御用新闻社国民新闻社,一边叫骂“国民之敌”“官僚新闻”一边袭击报社(田中贡太郎,1926:173-175),后又袭击了读卖新闻社,面对前来劝阻的警察,群众高呼“读卖新闻倒闭万岁!”(《时事评论》,1913:47)但更让帝国主义害怕的是此时社会主义运动对银座的浸染。1905年由堺利彦、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们主导的平民社主办了日本第一个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这也是银座街头首次出现劳动者的示威行动,他们高举红旗,沿途高唱社会主义歌曲,在银座集合后经京桥、日本桥向神田行进,最终抵达上野公园举行“劳动者观樱会”(《直言》,1905:7)。这为银座涂抹上了一层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色彩。但是部分运动的暴力破坏,也打击了银座对于政治批判活动的热情,加深了银座对于帝国主义的依附。

银座猛烈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大有重建银座政治批判形象的倾向,这迫使官方采取行动消解银座的政治批判意义。恰逢在大正时代,大众消费社会已经初步形成(竹村民郎,2015:序言2),银座浓厚的消费色彩便成为最佳手段。而一战不仅刺激了日本的经济,也终止了银座的欧洲化浪潮,自由、开放的美国文化开始涌入银座(原田宏,1975:127),极大刺激了消费主义的流行。

银座和“银逛”是大正东京的象征(爱德华·塞登斯蒂克,2017:269)，“银逛”萌芽于明治时代,成型于大正时代水岛尔保布,1924:21)。此时伴随资生堂、伊东屋等新兴商店逐渐取代江户明治时代的老商店,银座

作为高级商业街的形象已然确立(银芽会,1975:69)。关东大地震后,借由重建将原有的“粗鄙味”一扫而空(内田鲁庵,1933:4),日本各百货商店也在向银座扩张,松坂屋、松屋、三越在银座的分店相继开业,这为银座增添了独特的女性主义色彩。在此情况下,银座消费主义盛行,教摩登男女初次约会要在银座的高档咖啡馆(石黑晓美,1928:107)。银座由此成为东京最新奇时尚的街区(安藤更生,1931:51),是东京冲动消费的中心(小汀利得,1931:2)。而在银座和“银逛”发展历程中百货商店和咖啡馆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不可忽视的角色。

作为舶来品的百货店最初是向人们传达百货店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神野由纪,2022:97)。为此各大百货商店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发行各色刊物、举行各种文化活动、设置托儿所等,这就使得百货商店在很大程度上也充当着家庭游乐地的角色(山田忍三,1930:101),肩负着一定的社会公共责任。但自身商业与寄生属性又决定它们的宣传活动极为畸形,乃至与日本国家主义合流。例如三越百货就宣传“巴黎的流行服饰,银座也有”(羽生操,1929:19)、“只要来银座,能找到任何尖端流行的东西”(今和次郎,1932:35)。还编写诗歌“三越屋顶的灯亮起又熄灭,无奈地等待着朋友。霓虹灯招牌闪耀,即便融入银座,也愿投身那喧嚣之中”(《三越》,1931:24)。努力将银座消费、流行时尚和三越百货捆绑在一起。

银座的百货店与帝国主义的合流也在愈演愈烈。三越不仅在自家的百货店内频繁接待国内外权贵,其中不乏军国主义者,被冠以“第二国宾接待所”的称号(森集画堂编辑部,1909:98)。还积极参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宣传活动。诸如1918年所举办的洋画展览会选材北至桦太岛南至日占台湾,还囊括朝鲜半岛以及各租借地和岛屿(《三越》,1918:31),1922年设置东洋品部,搜集中国、爪哇、印度及殖民下的朝鲜等地的产品(《三越》,1922:24-25)。不同地区的景色和产品齐聚三越彰显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更为用心险恶的是,三越收集各殖民地儿童的玩具,举办所谓的“儿童博览会”,将帝国主义的种子植入孩童(《三越》,1915:25)。进入昭和时期,随着军国主义兴起,百货商店的帝国主义色彩越发强烈。1930年5月在上野松坂屋举行“满蒙博览会”,同年9月在三越举行“台湾博览会”(《人の噂》,1930:36)。而1931年3月松屋银座店则主办“朝鲜博览会”。并得到了拓务省、朝鲜总督府和鲜满协会的支持(《人の噂》,1931:171)。在此情况下,银座的政治批判色彩越发淡薄,通过消费的话语来宣传殖民和扩张却越发频繁。

而由于百货商店在扩大商圈和客源的优势,以及对其他商店的冲击,银座诸多商店开始向咖啡馆之类的料理店转型(小关孝子,2023:72)。关东大地震后,银座的咖啡馆的数量猛增,并逐渐取代了浅草的茶馆,留下了“银座是咖啡的王,咖啡是银座的王”的评价(安藤更生,1931:93)。银座的咖啡馆虽然产生时间早于百货店,但和银座联系紧密的新桥是明治以来权贵游兴的聚集地,影响后世日本政治的“密室政治”在此地发始(松川二郎,1932:14)。因此银座咖啡馆初期的顾客主要是出入出版社和新闻社的知识分子或者上流人士(松崎天民,1912:99)。但在关东大地震后,银座日渐游乐化,咖啡馆的服务对象也逐渐向全社会开放。

在银座浓厚的女性主义和日本严重的卖春问题的影响下,“老虎”咖啡馆率先打出了“美人女招待”的策略,咖啡馆的重点逐渐聚焦于美艳的女招待(小松直人,1931:33),并在营业方法上显示出强烈的挑逗,颓废的刺激(警保局,1929:13)。虽然咖啡馆纷纷宣传自己是“绅士社交场所为范本,追求华丽、高雅、坚实”(石角春之助,1937:239)。但却无法掩盖风俗咖啡馆的兴盛是建立在大量20-25岁的农村女性出卖尊严和肉体的基础之上(村岛归之,1929:176;「カフェーと女給」,1941:95),咖啡馆的社会形象迅速向低俗滑落。而伴随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色情咖啡馆反而迎来了自己的盛期。1930年大阪咖啡资本进军东京,将色情咖啡业推向巅峰,银座被大阪咖啡、大阪姑娘、大阪风俗的洪水所吞没(安藤更生,1977:116)。以至于社会传言“热衷银逛的疾病是咖啡中毒引起的,但去咖啡馆却不是喝咖啡”(小野田素梦,1930:44)。

消费主义虽然成功消解了银座的政治批判色彩,却无力赋予银座新的政治内涵,这使得银座迷失于消费主义的幻梦中,由此堕落为虚荣和腐败的象征。百货商店成为“奢华的源泉,免费观看的博览会,有闲阶

级喜好之处”(百货店商报社,1933:4)。而银座的咖啡馆则“即是最繁昌也是最低俗的,咖啡馆门口,总是站着三两女招待引诱着路人”(永井荷风,1951a:229)。东京此时所谓的“摩登”不过是“与生产生活无直接关联、仅靠消费构建生活的人群”局限于银座、丸之内大厦十字街等都市中特定场所的生活表现(高野岩三郎、权田保之助,1931:99)。社会也称那些在丸之内大厦周边及银座一带出现的摩登男女“其形象难以称为有益,反倒让人觉得有害”(根本十郎,1927:2)。银座却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变得极为繁荣,仅1925年一年,全区销售额为9257万9144日元,其中百货商店以2600万日元的销售额占比最大(时事新报经济部,1927:146-151)。此前斗争和批判的街区氛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爱慕虚荣、纸醉金迷的“银座病”风行社会(松崎天民,1927:207)。这里一方面是“洋服阶级”的欢乐境,有着不同于平民的浅草欢乐乡的贵族氛围(《辅成会会报》,1928:62),另一方面却是大量衣着破烂、精神失常的女乞丐坐在银行和百货商店门口行乞,每晚都有老弱男女数十人在银座行乞和行骗,以至于警察组建“乞食狩”维持治安(小野田素梦,1930:68-71)。

帝国主义下的银座,利用战争动员参与到对外扩张的分赃当中,并成功获取暴利,在此条件下不可避免地沦为帝国主义的拥趸。因此在面对银座风起云涌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官方最终得以通过强化控制和进行消费主义整合成功化解了银座的政治批判色彩。1929年,在关东出版劳动组合与中国驻日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下,“中华留日反帝大同盟日本支部”将该年8月28日至9月4日定为“反帝国主义斗争周”,计划在最后一天以“反对损害我们利益的帝国主义战争!归还中东铁路!从中国撤军!”为口号,组织从银座向中国大使馆和陆军省进军的示威游行(社会问题调查所,1931:66-68;町田晃,1930:171-175)。尽管按照“4日晚8时突然出现在银座松坂屋前”的指令行动,但警视厅特高课却得到线人举报提前在银座部署大量警员,最终示威失败,大量运动骨干被捕(实藤惠秀,1939:297)。这表明昭和前期,政府已利用消费主义整合和高压控制实现对银座政治批判活动的全面压制。

而消费主义不仅在消解银座的政治批判色彩,也在瓦解天皇政府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意识。由于摩登生活的承载者是近代意义上的食利者,他们创造的文化必然是空洞的、华美的、颓废的(藏原惟人,1930:131-132)。百货商店和咖啡馆在给银座带来了浓厚的女性主义的同时,街头满布的摩登男女们,却与官方认可的性别角色产生冲突(Tipton Elise K, 2008: 705-731)。银座商业中心里怀抱私生子和混血儿的职业妇人成为军国主义所憎恨的对象(山田わか,1927:76-77)。此时东京最繁华街区的咖啡馆成为情色交易的场地,百货商店也在谋求与帝国主义的合流。此阶段国家意志与资本权力形成共谋,利用消费主义成功消解银座的政治批判色彩,但却带来了银座的政治意义的缺位与迷茫。故在进入侵华战争阶段后,原本有着浓厚政治批判色彩的银座无力抵抗军国主义的侵蚀。

3 全面战争时期军国主义对空间的彻底征用(1931-1945)

面对凶猛的军国主义浪潮,陷入政治意义空虚的银座被迅速吞噬。九一八事变后原本作为消费主义地标的银座,政治意义被军国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重构,演变为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空间符号,银座被塑造为军国主义现代化成就的视觉化象征。无论是在对华殖民书本的文字表述中(实藤惠秀,1937:35),还是在中国的都市繁华场域内,银座成为对其繁华最好的夸赞(二川凌云,1937:361;浅见渊,1943:47;东京文理科大学汉文学科研究室,1939:72),被日本人灌入“繁华等于银座”的宣传口号。在国内,通过为军国主义服务,银座获得巨大收益。根据后世考证,昭和初期,“银座”仅指东京的一小片繁华区域,然而1931、1932年以来的十年时间,以“某某银座”之名的商业街竟遍布日本全国(木村庄八,1975:110-111)。

在战争初期(1931-1937)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积极利用银座商业活力和国际影响力进行战争动员,并为军国主义辩护。1932年永井荷风写道:“银座大街商店的玻璃上,多处张贴着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的照片,留声

机售卖店里大声播放着军歌。有时满街灯火一同亮起,仿佛全市都沉醉在战争胜利的荣耀之中”(永井荷风,1951b:209)。银座各商店亦积极响应军国主义的号召。三越银座店为附和军国主义专门发布的五月人形,玩偶以幼童少年的年龄,身穿军服,手捧武器或操作大炮(《三越》,1932:广告页)。资生堂银座店特地在店内举办自称“刘备后裔”的刘景淳的画展(《芸天》,1927:14;美术新论社,1933:64)。而在1935年4月迎接溥仪访日,银座格外耀眼,单单是装饰用的樱花树就安置了150棵、涂红的桃山门8处、杉树叶拱门24处(东京市役所,1936:159)。试图借此掩盖犯下的战争罪行(出口鹿一,1935:61-65)。银座女招待们也收集香烟锡纸筹款,打造“银座柳号”飞机支持侵略战争,这得到了“推动作为空军第二线的民间航空发展”为目标成立的“大日本义勇飞行会”的支持(『実業の世界』,1935:73;国民新闻社,1940:291)。由此将商业空间意识形态化,使日常生活与战争目标紧密关联,潜移默化地塑造公众对战争的认同。但在军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下,对于银座的抨击也越发激烈,其欧美色彩被指控为“殖民地化的粗俗氛围”(佐藤俊子,1937:93)。

1937年后,军国主义对银座的控制逐步加强,军国主义化进一步加深,军国主义活动越加频繁,国家力量直接渗入街区,国家意识逐步占据主导。1937年《百货店法》颁布,严格规定百货店的名称、营业时间、商品买卖种类和价格,由此将百货店纳入到政府统制之下,百货店逐渐向政府的物资配给机关转化,不仅是“物资”的配给,还有更为重要的“思想”的配给(玉利智子,1999:57)。在此情况下,三越不仅积极鼓励自己的员工进入日军服役,并将他们在中国服役的事迹编纂成书后发表(铃木孝五郎,1938:はしがき),8500名三越店员还筹款6万日元为日军添购战机(东京都中央区立京桥图书馆,1976:42)。而纵观整个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的百货商店在店内举行了无数次战争展览,诸如“陆军恤兵展览会”“大南洋展览会”“大东亚战争展览会”“军用机献纳作品展”等等(玉利智子,1999:57),从而将商业空间变为战争动员的工具。而随着战争的激化,银座的公共空间也被用于制造战争狂欢。南京沦陷时,马自达银座店、银座新闻剧院、森永银座店等纷纷打起招牌加入狂欢(『マツダ新報』,1938:54);武汉沦陷时,银座大街上又出现了庞大的小学生提灯游行队伍(《写真周报》,1938:9);在所谓的“兴亚奉公日”银座街头则到处叫嚣着“天皇陛下万岁!”(长濑谦,1940:122-123)然而在银座陷入癫狂之时,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却遭受着惨无人道的军国主义迫害,民众在银座的狂欢不仅是对被侵略国家的严重侮辱和伤害,也是日本社会对军国主义狂热支持的铁证。军国主义宣传机器也有意利用这种局面,试图通过仪式化的集体行动消解个体理性,来强化日本国内对战争的集体认同。

然而对外扩张的压力还是导致物资管制和抑制消费的施行。1940年7月7日《奢侈品制造贩卖限制规定》颁布,限制金银制品、铭仙、生丝制品等昂贵奢侈品的制造和贩卖,这导致银座的诸多高端商店陷入困顿,由于工艺品价格过低,银座的一家玳瑁制品店感叹道:“工匠和我们也只是勉强维持生计而已。但是那些有着悠久历史的青贝工艺品和蒔绘技艺的大师们该怎么办呢?”(东京都中央区役所,1958:180)但尽管如此,社会仍在鼓吹“已经有必要对沉浸在享乐主义的银座街道以彻底扫荡”(《大日》,1940:6),银座街头也发起了“把袖子改短”“停止烫发”的运动(资生堂,1957:319)。在银座,砂糖、火柴的配给从1940年6月1日开始,木炭的配给从11月1日开始,大米的配给从次年4月1日开始(三田村鸢鱼,1942:240)。外出就餐也需要外食券,这又给银座带来不小的打击(国策研究会,1941:14)。但此时银座已与军国主义捆绑,面对严厉的街区控制,银座诸多商店也只能应声附和,称赞管控后“提高了效率”“利于治疗‘银座病’患者”“限制营业时间有利于客人、员工和商家的健康”(野田丰吉,1939:82-83)。

1941年后,银座的空间功能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发生了根本性转向,它沦为军国主义的战争工具。它成为日本国内物资配给的重心,是全国石炭统制联合会、全国酸素联合会、全日本商店会联盟、帝国马匹协会、日本汽车输出组合、日本汽车轮胎工业组合和日本人造织物工业组合联合会等机构的驻地(中央物价统制协力会议,1941:220-222、225、232、233)。在此情况下,银座成为各方势力活动的焦点。在苏联特工佐尔格

被捕事件当中,银座成为佐尔格等人的主要活动地点(竹崎羊之助,1949:69-70),日本共产党人尾崎秀实和西园寺公一就经常在银座七丁目的料亭“米村”进行密会,交付“对美申入书”等日军重要文件,此外歌舞伎座附近的“京亭”也是间谍活跃的地方,银座的餐厅此时多数已沦为在日间谍的活动中心(筑地警察署史編集委员会,1973:463)。而在偷袭珍珠港前,为了迷惑美军,日本国内大张旗鼓地在12月5-7日,借海军放假为名,特地让横须贺海军基地的三千多名水兵学员穿着水兵服前往银座娱乐和消费,这三日内有一万名左右的水兵在银座活动(平出英夫,1942:21),并刻意让美国大使馆“想不知道也得知道”(平出英夫,1942:4)。从而为日本联合舰队顺利进入攻击位置提供掩护。

虽然银座在偷袭珍珠港中蜕变为军国主义的帮凶,但是作为一座欧美风格的街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存在与军国主义日渐冲突。在1941年12月23日,大政翼赞会旗下的兴亚写真报国会银座街头举行旨在记录“美国风潮”的拍摄,最后将此次拍摄行动发布在它们的机关刊物《日轮》上。他们与所辖的筑地警察署交涉,最终确定从银座二丁目青木靴店街角到新桥的主街道进行拍摄,并在当时早稻田大学教授、考现学权威今和次郎(此时也是大政翼赞会成员)的指导下进行拍摄。文章以“消除美国气味,银座街头相机列阵”“相机描绘的可耻后方”等为题目,以随处可见的美国元素为批判对象。文中强调“在银座追求享乐的这种心态,正是我们要从决战下的日本消除美国风潮的原因”(《日轮》,1942:16-19)。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宣传对英美作战取得阶段胜利的平台。1942年2月日军进攻东南亚,顺利夺取英国在东南亚的重镇新加坡,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沸腾“为了表达对出征将兵的感谢,体现增产节约的觉悟,延续开战以来的气势”,国内举行“第一次战捷祝贺日”。这一天的银座“广播中播放着空袭(敌方)的消息,年轻人狂热的身影映入眼帘。银座周边店铺,兴奋的人群熙熙攘攘,脸上洋溢着笑容”(御料林,1942:80)。

1943年后,日本军国主义冒险受到严重挫折,此时的银座百业萧条。如同永井荷风在1944年1月10日写道:“银座一带,无论什么行业,停业的店铺日益增多。所谓的‘兴亚共荣’,大概就是这样荒废的景象吧”(永井荷风,1972:425)。但是银座军国主义话语塑造仍没有停止,银座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也被政府利用打造成战争动员的工具,鼓动女性参与女子部队来协助国内的军国主义活动(《都政周报》,1943:14)。为了更好地契合“决战色”,符合军国主义的话语塑造,银座的诸多商店也纷纷改变自己用“敌性语”写成的店名,格兰特咖啡馆改为大和会馆、老虎咖啡馆改为太平洋、兰奇埃拉改为兰(『新聞集成昭和史の証言』第18卷,1987:192)。而为了给军工提供钢铁,日本国内开始回收钢铁(「金属特別回収令要綱案」,1941:1),借神武天皇祭,军国主义政府不仅回收了银座街区的路灯,还将其作为军国主义宣传的样本,以契合军国主义下的话语体系(武和襄二,1943:31)。

如此情况下,银座自然不可能被反法西斯阵营忽视。邦枝完二在1945年的一次轰炸后的日记中写道:“这次B29的轰炸,让银座几乎回到了大正十二年关东大地震时的模样,被烧得面目全非,化为了一片灰烬”(有马赖义,1971:368)。而核爆也给银座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打击,大屋典一在日记里写道:“(搭载核弹的轰炸机)为什么没去广岛而来了长崎呢?谁都会这么去思考吧。当然,其他城市的人大概也会这么想。然后会想今天怎么没在自己的头顶上呢。与广岛之前的炸弹不同,这次已经不能用偶然来解释了。银座遭空袭的时候,我从地下室的窥视孔看到有老人和孩子死去。然而那时是以整个城市为单位。一旦被投下(核弹)就是全城毁灭”(昭和戦争文学全集編集委员会,1965:403)。5月24、25日的空袭是银座所在的京桥区遭受的最后一次空袭,这次空袭一共出动250架B29轰炸机对城市中心残存的建筑进行地毯式轰炸,银座的三越、松屋、御木本珍珠店和鸠居堂等被烧毁(东京都中央区役所,1958:854-855)。1944年12月到1945年8月不到一年时间内,银座所在的京桥区因战争伤亡30838人(东京都中央区立京桥图书馆,1980:207)。

伴随日本的军国主义化,银座也逐渐沦为军国主义战争动员机器的一部分。战争初期,银座的消费文化表面上与军国主义的“节俭”宣传相冲突,甚至于成为军国主义分子们争相批判的对象。但丰厚的商业利

润却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提供了大量物质支持,银座街头的广告牌、橱窗和游行活动也被用于宣扬“忠君爱国”“东亚共荣”等话语,成为日本国内战争动员体系的一部分。而随着战争深入和银座主动参与军国主义话语的生产,银座也被军国主义战时经济体制吞噬。1940年《奢侈品制造贩卖限制规定》颁布后,银座的奢侈品商店被迫转型,高档消费被“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压制,大量为军国主义服务的机构在银座设立,这意味着银座单纯的话语建构已无法满足军国主义的需求,军国主义渴求对银座进一步控制。由此银座作为商业街的功能遭到彻底压制,沦为各国间谍活动的焦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工具,而银座也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4 结 语

明治时期的炼瓦街建设是为了摆脱殖民危机迎合西洋文明而强行推进的“文明开化”看板。明治政府试图通过模仿西洋殖民地建筑风格,功利性的追求与西洋文明靠拢,但赋予银座“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的政治话语,与德川时代延续下来的生活文化和习俗产生了脱离和断裂,引发了民众的抵触。至自由民权时期,银座又被反对藩阀政治的精英与此前抵触的民众结合起来,重新赋予反抗藩阀政府的政治意义。虽然利用扩张国权和对外扩张暂时平息了内部矛盾,但这也为后续各方力量利用公共空间进而影响民众埋下伏笔。

大正时期,银座的话语争夺进一步复杂化:表面上,百货商店、咖啡馆等新型消费空间的兴起所带来的摩登文化与女性主义看似是对国家权威的抵抗,但实则代表了帝国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合流。通过情色产业的泛滥与消费主义的潮流,完成了对银座政治批判功能的消解。社会的抵抗也因受限于天皇制框架与资产阶级改革的未完成性,始终未能生成替代性现代方案,银座此时的政治意义建构以失败告终。消费主义催生的腐败和堕落则成为刺激军国主义兴起的催化剂。

至昭和战争时期,军国主义顺利接管了陷入消费主义幻梦中的银座,并对其政治意义进行重构。通过物资配给、意识形态宣传与军国主义活动的军事化改造,银座从消费、生活、娱乐的空间异化为军国主义的规训工具。这种空间转型不仅消弭了民众的主体性,更将社会意识整合为对外扩张的共谋力量。

由此银座的这种“从反抗到规训再到消解”模式深入日本社会。战后由于日本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改变,银座的政治批判功能虽然一度被重建,但也无法摆脱这套模式的影响。在日本人民安保斗争运动当中,日本左翼力量虽然竭力塑造银座的政治批判话语以唤醒民众的觉悟。1960年是安保斗争的高潮,“5月20日银座大街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彻夜的罢工与支援活动虽然疲惫,但许多劳动者和学生仍彻夜将声音传向国会和美国大使馆。”(編集部,1960:27)但当反抗的声音重新汇集银座之时,由池田勇人政府制造的“收入倍增计划”又引导制造出“日本潮流之源、高级精品购物街,此地尽显优雅不凡,早早展现出成熟风范,这般种种,无疑是令人渴慕的勋章”(しまのあきお,1966:39)的话语,又逐渐消解了银座的政治批判色彩,从这一点上看,日本政府实际上延续了银座战前的话语构建手段。

综上,银座在近代日本历史的不同时段分别被官方和民间赋予不同的政治含义,双方围绕欧化与传统、民权与国权、帝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展开各自的话语权争夺。整个历程中,虽然各方互有胜负,但是官方始终占据优势,这为最终由军国主义统合银座其他的政治意义,将其转化为战争工具埋下伏笔。而这种由官方主导塑造历史记忆和政治话语的方式也延续到战后日本对以银座为代表的公共空间意义的重构。银座空间话语建构从“现代化象征”到“战争工具”的转变,反映出日本现代化一直存在着军事化和殖民化困境。从银座的历史作用来看,银座既是日本畸形现代化被动承受者,也是主动参与者,其双重角色为当代空间政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

[本文系2022年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农业的掠夺研究”(项目编号:22B021)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瞿亮;2023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地方高校世界史教学中对中国历史的书写与评价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瞿亮]

参考文献

- 竹村民郎. 大正文化: 帝国日本の乌托邦時代[M]. 欧阳晓,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21.
- 爱德华·塞登斯蒂克. 东京百年史: 从江戸到昭和, 1867-1989[M]. 谢思远, 刘娜, 译. 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 いよいよ三月十七日より朝鮮博覧会の開催: 帝都・銀座・松屋に於て[J]. 人の噂, 1931, 2(1).
- カフェーと女給: A05020355000[DB/OL].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1941-07-10: 95(55 画像目)[2025-06-15].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img.pdf/3834793>.
- しまの・あきお. 銀座の復活[J]. 東京だより, 1966(62).
- スターは宣伝がお上手: 光野嬢のパラシュート奇難[J]. 実業の世界, 1935, 32(10).
- ディスターネル. 米国行独案内: 一名・桑港事情[M]. 富田源太郎, 大和田弥吉, 訳. 横浜: 富田源太郎, 1885.
- 一九三一年のトップを切る朝鮮博覧会の開催: 帝都・銀座・松屋に於て[J]. 人の噂, 1930, 1(8).
- 一亭呑気. 金の欲しい人に告ぐ[J]. 團圓珍聞, 1897(1134).
- 二川凌雲. 世界一周嘔旅行記[M]. 京都: 文化時報社, 1937.
- 三田村鳶魚. 伸び行く銀座[M]. 東京: 銀座二丁目町会, 1942.
- 三原国一郎. 初学商業書: 後編[M]. 東京: 中近堂, 1888.
- 三越に開かれし児童博覧会[J]. 三越, 1915, 5(4).
- 大阪三越だより[J]. 三越, 1918, 8(2).
- 大東亜戦下銀座街頭に於るアメリカ風潮記録撮影記[J]. 日輪, 1942, 2(2).
- 大隈重信. 大隈伯時局談[M]. 武井宗十郎, 編. 東京: 博文館, 1905.
- 大審院. 大審院刑事判決録[M]. 東京: 司法省, 1891.
- 小汀利得. 街頭経済学[M]. 東京: 千倉書房, 1931.
- 小松直人. Caf joky nouraomote[M]. 東京: 二松堂, 1931.
- 小島猪三郎. 新撰東京案内鑑[M]. 東京: 指南社, 1893.
- 小野田素夢. 銀座通[M]. 東京: 四六書院, 1930.
- 小笠原美治. 官令全報: 第29号[M]. 東京: 弘令社, 1883.
- 小関孝子. 夜の銀座史: 明治・大正・昭和を生きた女給たち[M]. 京都: ミネルヴァ書房, 2023.
- 山本謙次郎. 紀元節[M]. 東京: 日本法律社, 1889.
- 山田わか. 昭和婦人読本: 処女篇[M]. 東京: 文教書院, 1927.
- 山田忍三. 百貨店経営と小売業[M]. 東京: 千倉書房, 1930.
- 千住製絨所[J]. 染織新報, 1905(163).
- 丸山正彦. 大御代賀[J]. 日本文学, 1889, 7.
- 久米邦武. 特命全權大使米欧回覧実記: 第2篇 英吉利国ノ部[M]. 東京: 博聞社, 1878.
- 木下敬正. 勸業功績録: 第1編[M]. 東京: 青年教育義会, 1903.
- 木戸公伝記編纂所. 木戸孝允文書: 第7[M]. 東京: 日本史籍協会, 1931.
- 木村莊八. 東京風俗帖[M]. 東京: 青蛙房, 1975.
- 中央物価統制協力会議. 中央物価統制協力会議年報: 第1[M]. 東京: 中央物価統制協力会議, 1941.
- 中野了随. 見光主義自由燈: 一名・卑屈の目ざまし[M]. 東京: 帶川堂, 1884.
- 内田誠. 銀座[M]. 東京: 改造社, 1940.
- 内田魯庵. 読書放浪: 魯庵隨筆[M]. 東京: 書物展望社, 1933.
- 水島爾保布. 新東京繁昌記[M]. 東京: 日本評論社, 1924.
- 今和次郎. 服装と流行[J]. 三越, 1932, 22(4).
- 公治長の後裔[J]. 團圓珍聞, 1882(282).
- 玉利智子. 日本における百貨店の社会的機能に関する一考察——消費社会にみる「視線」と「現代消費者形成」の社会史[J]. 文化経済学, 1999, 1(4).
- 本富北山. 地方生指針[M]. 東京: 嵩山房, 1887.

- 石川義暢. 開化詩集[M]. 東京: 以文会社, 1882.
- 石川諒一. 民権自由党史[M]. 2版. 東京: 民権自由党史出版局, 1929.
- 石角春之助. 銀座秘録[M]. 東京: 東華書莊, 1937.
- 石黒暁美. モダン・ガール物語[M]. 東京: 良栄堂, 1928.
- 石塚裕道, 成田竜一. 東京都の百年[M]. 東京: 山川出版社, 1986.
- 平出英夫. 太平洋の三日間[J]. 刑政, 1942, 55(2).
- 平出英夫. 太平洋上不滅の戦果[M]. 松江: 大政翼賛会島根県支部, 1942.
- 田中貢太郎. 貢太郎見聞録[M]. 大阪: 大阪毎日新聞社, 1926.
- 田中彰. 未完の明治維新[M]. 東京: 三省堂, 1968.
- 由利兼次郎. 東京自慢: 名所手続[M]. 東京: 熊谷庄七, 1878.
- 永井荷風. 荷風全集: 第16巻[M].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51a.
- 永井荷風. 荷風全集: 第20巻[M].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51b.
- 永井荷風. 荷風全集: 第23巻[M]. 東京: 岩波書店, 1972.
- 出口鹿一. 満洲国皇帝奉迎式に臨みて[J]. 法曹公論, 193539(5).
- 出征者便り[J]. 御料林, 1942(169).
- 寺尾熊三. 女子教育の私見を述べて巖本兄に寄す[J]. 女学雑誌, 1890(224).
- 有馬頼義. 東京空襲19人の証言[M]. 東京: 講談社, 1971.
- 百貨店商報社. 日本百貨店総覧: 第1巻 三越[M]. 東京: 百貨店商報社, 1933.
- 同志の運動: 労働者観桜会の記[J]. 直言, 1905, 2(10).
- 竹崎羊之助. 二つの祖国: ノルゲ・尾崎事件の全貌[M]. 東京: 中央社, 1949.
- 竹越與三郎. 新日本史: 上[M]. 東京: 民友社, 1891.
- 名古屋局. 奢侈品制限令と絹織物機業界: A18110434300[DB/OL].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1940-08-01: 1(1画像目)[2025-05-15].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img/4317928>.
- 江沢富翁. 商道先駆: 天賞堂五十年の回顧[M]. 東京: 四海書房, 1940.
- 宇田友猪, 和田三郎. 自由党史上[M]. 東京: 五車楼, 1910.
- 安藤更生. 銀座細見[M].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77.
- 安藤更生. 銀座細見[M]. 東京: 春陽堂, 1931.
- 防空完璧の銀座中央部: 女子部隊も大活躍[J]. 都政週報, 1943(11).
- 羽生操. 巴里の流行を語る[J]. 三越, 1929, 19(11).
- 村島帰之. カフェー: 歓楽の王宮[M]. 東京: 文化生活研究会, 1929.
- 児玉永成. 東京案内[M]. 東京: 錦栄堂, 1884.
- 町田晃. 銀座街頭のデモ[J]. 戦旗, 1930, 3(2).
- 佐々木恵璋. 日清交戦法の光[M]. 京都: 興教書院, 1894.
- 佐藤俊子. 銀座の夜[J]. 文藝, 1937, 5(4).
- 初田亨. 百貨店の誕生[M]. 東京: 筑摩書房, 1999.
- 初田亨. 東京都市の明治[M]. 東京: 筑摩書房, 1994.
- 初田亨. 都市の明治: 路上からの建築史[M]. 東京: 筑摩書房, 1981.
- 社会問題調査所. 最近の労働争議: 上巻[M]. 東京: 社会問題調査所, 1931.
- 阿部又郎. 集会条例釈明: 和仏対照[M]. 東京: 報告社, 1882.
- 武和襄二. 街路燈鐵柱の應召[J]. 照明, 1943, 9(4).
- 青木宏一郎. 明治東京庶民の楽しみ[M]. 東京: 中央公論新社, 2004.
- 長瀬謙. 銀座だより[J]. 経國, 1940, 7(6).
- 若林欽. 航北日記[J]. 兵事雑誌, 1898, 3(3).
- 松川二郎. 三都花街めぐり[M]. 東京: 誠文堂, 1932.
- 松崎天民. 淪落の女[M]. 東京: 磯部甲陽堂, 1912.

- 松崎天民. 銀座[M]. 東京: 銀ぶらガイド社, 1927.
- 東京に於ける南京陥落の慶祝[J]. マツダ新報, 1938, 25(1).
- 東京六新聞社説旬日表[J]. 交詢雑誌, 1885(174).
- 東京文理科大学漢文学科研究室. 新東亜見聞録[M]. 東京: 文化クラブ, 1939.
- 東京市役所. 満洲国皇帝陛下東京市奉迎志[M]. 東京: 東京市役所, 1936.
- 東京都中央区立京橋図書館. 中央区年表: 昭和時代Ⅱ(準戦時体制篇)[M]. 東京: 東京都中央区立京橋図書館, 1976.
- 東京都中央区立京橋図書館. 中央区年表: 昭和時代Ⅳ(戦時生活篇)[M]. 東京: 東京都中央区立京橋図書館, 1980.
- 東京都中央区役所. 中央区史: 下巻[M]. 東京: 東京都中央区役所, 1958.
- 東京都中央区役所. 中央区史: 中巻[M]. 東京: 東京都中央区役所, 1958.
- 東京銀座街[J]. 商業資料, 1896, 3(2).
- 東洋趣味について——東洋品部の商品一般[J]. 三越, 1922, 12(10).
- 国民新聞社. 昭和十二年国民年鑑[M]. 東京: 国民新聞社, 1940.
- 国策研究会. インフレーション対策試案: インフレ対策委員会研究報告(報告書第28号)[M]. 東京: 国策研究会, 1941.
- 岩谷商会. 恭賀新年大日本帝国万歳(マルチン広告)[J]. 團圓珍聞, 1901(1300).
- 岩谷商会. 国益天狗愛国天狗(マルチン広告)[J]. 團圓珍聞, 1902(1375).
- 岡本哲志. 銀座: 土地と建物が語る街の歴史[M]. 東京: 法政大学出版局, 2003.
- 岡本哲志. 銀座四百年: 都市空間の歴史[M]. 東京: 講談社, 2006.
- 金子佐平. 東京新繁昌記[M]. 東京: 東京新繁昌記発行所, 1887.
- 金属特別回収令要綱案(昭和一六. 七. 一〇): A15060236600[DB/OL].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1941-07-10: 1(1画像目)[2025-06-15].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img/1628156>.
- 実藤恵秀.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M]. 東京: 日華学会, 1939.
- 実藤恵秀. 中国現代文選[M]. 東京: 文求堂書店, 1937.
- 貞包英之. 近代における消費の変容: 勸工場から百貨店へ[J]. 山形大学紀要(人文科学), 2012, 17(3).
- 昭和戦争文学全集編集委員会. 昭和戦争文学全集: 第14 市民の日記[M]. 東京: 集英社, 1965.
- 神野由紀. マーケティング史からみた日本の初期百貨店[J]. マーケティング史研究, 2022, 1(1).
- 馬場不知姦齋(穀). 暗窓余楽[M]. 東京: 春霞堂, 1881.
- 都下奉祝景況[J]. 憲法雑誌, 1889(1).
- 真の養生家は麦飯を食せず[J]. 團圓珍聞, 1883(378).
- 根本十郎. 毛断害有[M]. 東京: 嵩文堂, 1927.
- 原田宏. 銀座故事物語[M]. 東京: 新人物往来社, 1975.
- 時事新報経済部. ビジネス・センター[M]. 東京: 東洋経済新報社出版部, 1927.
- 高野岩三郎, 権田保之助. 社会・経済・統計研究叢書: 高野博士還暦祝賀記念第12巻[M]. 東京: 巖松堂書店, 1931.
- 高梨哲四郎. 北米政治家ノ腐敗[J]. 嚶鳴雑誌, 1881(29).
- 現代世相のぞ記: 銀座〔下〕[J]. 輔成会会報, 1928, 12(5).
- 菅復三. 東京名所指南: 雅俗類編[M]. 東京: 小杉賢治, 1890.
- 奢侈禁止令[J]. 大日, 1940(227).
- 野口孝一. 明治・大正・昭和銀座ハイカラ女性史: 新聞記者、美容家、マネキンガール、カフェー女給まで[M]. 東京: 平凡社, 2024.
- 野口孝一. 銀座煉瓦街と首都民権[M]. 東京: 悠思社, 1992.
- 野田幸内. 東京諸商業繁栄録[M]. 東京: 開成社, 1883.
- 野田豊吉. 商店法実施後に商店は如何に能率が増進したか[J]. 実業の世界, 1939, 36(4).
- 第二日比谷事件史[J]. 時事評論, 1913, 8(4).
- 清水義郎. 憲法発布大典賑[M]. 東京: 牧金之助, 1889.
- 浅見淵. 満洲文化記[M]. 新京(長春): 国民画報社, 1943.
- 深満池源次郎. 東京商工博覧絵: 上[M]. 東京: 深満池源次郎, 1885.
- 森集画堂編集部. 東京案内[M]. 東京: 森集画堂, 1909.

- 閑亭茂. 旧弊自慢徳川天下[M]. 東京: 横田兼太郎, 1884.
- 富山県警察部. 法規提要[M]. 富山: 富山県警察部, 1893.
- 農工商事項[N]. 官報, 1886-04-12.
- 鈴木孝五郎. はしがき[M]//玉井肇. 戦陣余芳: 第2輯. 東京: 三越応召軍人後援会, 1938.
- 資生堂. 資生堂社史: 資生堂と銀座のあゆみ八十五年[M]. 東京: 資生堂, 1957.
- 新聞集成昭和史の証言: 第18巻[M]. 東京: 本邦書籍, 1987.
- 福井淳. 雄弁大家演説集[M]. 東京: 忠雅堂, 1888.
- 福岡照. 起業立志の金門: 一名・米行者必携[M]. 東京: 日新堂, 1887.
- 蔵原惟人.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のために[M]. 東京: 戦旗社, 1930.
- 閑梅痴(槎盆子). 東京銀街小誌初篇[M]. 東京: 山田孝之助, 1882.
- 銀芽会. 銀座わが街: 四百年の歩み[M]. 東京: 白馬出版, 1975.
- 銀座の灯[J]. 三越, 1931, 21(8).
- 旗の波[J]. 写真週報, 1938(39).
- 劉日影氏畫会[J]. 芸天, 1927(37/38).
- 劉景淳氏個展[J]. 美術新論, 1933, 8(3).
- 編集部. 五・一九からの一ヶ月[J]. 月刊社会党, 1960(38).
- 築地警察署史編集委員会. 築地警察署史[M]. 東京: 警視庁築地警察署, 1973.
- 藤江堪藏. 参観集会条例[M]. 東京: 早川摘要社, 1881.
- 藤森照信, 小沢尚. 東京のまちづくり: 近代都市はどうつくられたか[M]. 東京: 彰国社, 1986.
- 藤森照信. 明治の東京計画[M]. 東京: 岩波書店, 1982.
- 鶴月洋. 広告文の歴史: キャッチフレーズの100年[M]. 東京: 日本経済新聞社, 1965.
- 警保局. 「カフェー」に関する調: A05020149300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1929; 13(19画像目)[2025-06-15].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img/pdf/1034780>.
- The Ginza At Night: Tokyo's Cosmopolitan Thoroughfare[N]. The Times, 1918-08-16(5).
- Tipton E K. Cleansing the Nation: Urban Entertainments and Moral Reform in Interwar Japan[J]. Modern Asian Studies, 2008, 42(4).

作者简介: 瞿亮 男 汉族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近现代日本文化史、中日文化交流史

联系方式: E-mail: quliang1983@foxmail.com

作者简介: 申健鹏 男 汉族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近现代日本文化史、中日文化交流史

联系方式: E-mail: 1045261417@qq.com

Spatial Practice & Discourse Struggles: Ginza's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1872–1945)

QU Liang & SHEN Jianpeng

(Xiangtan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paradigmatic case of spatial politics in modern Japan, Ginza's development embodies the discursive contestation between state power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amid modernization, colonial expansion, and war mobilization. From the Meiji to early Showa period, the two sides vied for its discourse power. In the Showa war and militarization era, the state realized the street's militarized transformation through propagandistic systems—turning it into a military propaganda space and a template for imperialist spatial colonialism. This evolution reflects the government-public discourse struggle in Japan's modernization and reveals the structural predicament of cultural rupture, social division, and eroded popular subjectivity.

Keywords: modern Japan; Ginza; imperialism; consumerism; militarism

(责任编辑: 王晨萌)